

TPP 的投资区位效应及非 TPP 亚太国家的应对措施^{*} ——基于多国自由资本模型的分析

许培源, 魏 丹

(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 要:文章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基础,结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引入多国自由资本模型,数值模拟了 TPP 的投资区位效应及非 TPP 亚太国家的应对措施。结果表明:(1)TPP 的形成会导致双重投资区位效应:在 TPP 内部,规模大的国家将拥有更多的工业品市场份额,成为核心国;在 TPP 外部,随着 TPP 内部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外部国家的投资会流向 TPP 成员国,进一步放大投资区位效应。双重投资区位效应左右着亚太地区国际生产布局。(2)作为应对措施,RCEP 的提前达成将是一个不错的现实选择;若 RCEP 与 TPP 同时达成,则具有 TPP 和 RCEP 双重身份的国家获益最大。因此,中国应积极同 TPP 成员国签订双边或多边 FTA,主动参与东盟主导的 RCEP,最大限度地减少 TPP 的冲击。

关键词:TPP;投资区位效应;多国自由资本模型;RCEP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5)03-0077-11

一、引 言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尚未正式生效,就已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已远超一般的 FTA。TPP 的形成与走向会改变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亚太地区的合作格局,并在该地区形成极强的投资区位效应。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和亚洲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尽管加入 TPP 的可能性很小,但 TPP 将对其和平崛起进程构成重大挑战。被 TPP 排除在外不仅意味着将受到“排他性效应”的冲击,而且过去 10 年中国所致力推动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也有可能因此而发生逆转(李向阳,2012)。一旦“纺纱前沿”原产地规则等 TPP 相关协定成为现实,亚太地区的投资区位布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研究 TPP 的投资区位效应及非 TPP 亚太国家的应对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对 TPP 的研究大多始于 2009 年美国高调宣布加入 TPP 谈判之后;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1)TPP 基本概况。围绕 TPP 的建立、发展背景、内容以及特点等,对未来 TPP 谈判进程和发展趋势以及日本参加的难题进行分析(刘昌黎,2011;Seshadri,2013)。(2)政治战略层面。美国之所以积极推动并主导 TPP,因为 TPP 是美国实现其贸易议程和亚洲外交政策理想有力的工具(Lewis,2011),也是美国实现“回归亚太”战略途径之一,Lewis (2011)认为 TPP 是通向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途径,是亚太经济合作形式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一个举措。(3)经济影响层面。一部分学者结合 TPP 谈判的进展,对

收稿日期:2014-09-04

作者简介:许培源(1970—),男,福建安溪人,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 丹(1981—),女,辽宁锦州人,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TPP 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进行比较分析(Williams, 2013),或者分析 TPP 的成本收益,认为经济小国可能从中获益,但经济大国基本没有收益(沈铭辉, 2012);另一部分学者则运用计量方法,引入基于 CGE 的 GTAP 模型来测算 TPP 的经济收益(万璐, 2011)。对于自由贸易区下的直接投资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产业区位转移的研究则要比 TPP 研究久远得多,然而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才引起广泛的关注。Baldwin 和 Venables (1995)把自由贸易协定对成员国内部和成员国之间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的影响称为“区位优势”。Puga 和 Venables(1997)以 Krugman(1991)的中心—外围模型(CP 模型)为基础,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研究了“轮轴—辐条”型 FTA 的产业区位,并指出“轮轴—辐条”型 FTA 有利于轮轴国区位,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会引发产业在轮轴国的集聚,并可能导致辐条国之间的发展不平等。但由于“CP”模型只采用劳动力一种生产要素,其生产的转移意味着劳动力的转移,因而在分析国际经济问题上显得有些牵强。Martin 和 Rogers(1995)提出的自由资本模型(“FC”模型)修订了“CP”模型的假定,假设模型中存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且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由于资本所有者不流动,资本收益将返回资本流出国。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转移就具有国际直接投资的意义,即生产的转移等同于国家间的资本流动,而资本的流动形成了国际直接投资(Baldwin 等, 1996)。鲁晓东(2009)构建了带有区域化特征的四国八地区的自由资本模型,模拟分析了南北型、北北型以及南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规模、流动方向和区位分布的差异化影响。

总体来看,已有文献鲜少提及 TPP 形成后,亚太地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如何发生和变化的,而对中国参加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能否有效缓解 TPP 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研究也还处于起步阶段。考虑到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模型具有“生产的转移等同于国家间的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具有国际直接投资意义”的特征,其理论框架及模拟与分析方法完全吻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因此,为了更好地体现 TPP 下亚太地区国际生产布局的变化,本文从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应用多国自由资本模型,对 TPP 达成或 RCEP 达成引发的亚太地区的国际投资区位优势效应进行模拟,进而分析 TPP、RCEP、TPP 与 RCEP 共存三种情况下各类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尤其是中国及其他亚太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文章余下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介绍多国自由资本模型及非对称情形下的矩阵形式;第三部分基于理论模型模拟 TPP 达成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优势效应及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应对策略;第四部分总结全文、给出政策建议和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

二、多国自由资本模型(R-FC Model)

相异于传统的企业投资的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注重从动态和内生角度去解释区位选择,认为区域之间在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等非均衡力作用下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是企业区位选择和生产布局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某一区位优势不断得到发展会使该区位优势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这也是导致经济集聚的关键,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对循环累积因果机制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企业区位选择与市场规模的大小以及区内区外贸易自由度的大小有关:企业将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将选择区内贸易自由度较大的区域;当区际贸易自由度很大时,企业的生产区位变得不稳定,趋于向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转移。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多国自由资本模型正是基于上述机理,从贸易自由度变化引起市场规模变化、市场规模变化导致生产和投资分布发生变化这一角度来讨论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对参与国和非参与国的影响(安虎森, 2009)。

(一)基本假定

假设经济体中有 R 个国家,它们的生产技术、贸易自由度和要素禀赋相同,每个国家内部有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分别生产农产品(A)和工业品(M),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其中,资本可以跨国自由流动,劳动力供给固定且不可流动。农业部门具有完全竞争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特征,生产一单位农产品需要 a_A 单位的劳动力,价格等于成本,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农产品在任何地方的价格都相等,即 $p_{Ai} = a_A w_i = p_{Aj} = a_A w_j$ ($i \neq j; i, j = 1, 2, \dots, R$, 以下相同),进而可得 $w_i = w_j = w$ 。工业部门具有 Dixit-Stiglitz 的垄断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特征,每种差异化工工业品的生产使用一单位资本为固定成本、 a_M 单位劳动为可变成本,则国家 i 内企业的成本函数为: $TC_i = r_i + a_M w x_i$ 。

R 个国家内所有消费者的偏好相同且具有双重效用,即总效用函数为“柯布一道格拉斯”型($C-D$)效用函数,子效用函数为不变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也即:

$$U = M^\mu A^{1-\mu}, M = \left(\int_{i=0}^{n^w} m_i^{1-1/\sigma} d_i \right)^{1/(1-1/\sigma)}, 0 < \mu < 1, \sigma > 1 \quad (1)$$

其中, A 和 M 分别表示消费者对农产品和差异化工工业品组合的消费; n^w 为所有工业品种类数($n^w = n_1 + n_2 + \dots + n_R$); μ 是消费者工业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σ 是任意两种工业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假定该弹性值保持不变。国家 i 消费者面对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为:

$$P_{Mi} = \left(\int_{i=0}^{n^w} p_i^{1-\sigma} d_i \right)^{1/(1-\sigma)} \quad (2)$$

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可得其对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最优消费量分别为:

$$M_i^* = \mu E_i / P_{Mi}, A_i^* = (1-\mu) E_i / P_A \quad (3)$$

E_i 是国家 i 消费者的名义收入(等于支出)。 M_i^* 是对 R 个国家的 CES 加总,也即:

$$m_{ij} = \mu E_i \cdot (p_{ij})^{-\sigma} / (P_{Mi})^{1-\sigma} \quad (4)$$

其中, m_{ij} 表示国家 i 对国家 j 产品的需求。

考虑冰山运输成本, $p_{ij} = \tau_{ij} p_{ii}$, 其中, 当 $i = j$ 时, $\tau_{ii} = \tau_{jj} = 1, p_{ij} = p_{ii} = p_i$ 。因此国家 i 内厂商的产出量为:

$$x_i = \sum_j \tau_{ij} m_{ij} \quad (5)$$

(二)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

在短期均衡中,市场完全出清,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每个国家内部资本存量保持不变。工业品市场为垄断竞争市场,其定价为:

$$p_i = \tau_{ij} w a_M / (1 - 1/\sigma) \quad (6)$$

在垄断竞争情况下,企业获得零超额利润,销售收入等于生产成本,根据工业品最优定价(式(6))和市场需求(式(2)一式(5)),可求出位于国家 i 的典型厂商的资本收益函数为:

$$\pi^i = p x / \sigma = \frac{\mu}{\sigma} \left[E_i / (n_i + \sum_{j \neq i} n_j \phi_{ij}) + \sum_{j \neq i} E_j \phi_{ij} / (n_j + \sum_{l \neq j} n_l \phi_{il}) \right] \quad (7)$$

其中, $\phi_{ij} = \tau_{ij}^{1-\sigma}$ 表示贸易自由度, $\phi_{ij} \in [0, 1]$; 当 $\tau_{ij} = 1$ 时, $\phi_{ij} = 1$; 当 $\tau_{ij} \rightarrow \infty$ 时, $\phi_{ij} = 0$ 。

在长期,资本收益是资本跨界流动的关键。资本会向收益率大的国家流动,直到国家间资本收益均等($\pi^i = \pi^j$),此时工业在每个国家都有一定分布,资本收益在每个国家都相等。根据式(7),可得位于国家 i 的工业品市场份额^①(s_n^i)为:

①此处假设任意两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度是对称的,均为 ϕ 。

$$s_n^i - \frac{1}{R} = \left(1 + \frac{R\phi}{1-\phi}\right) \left(s_E^i - \frac{1}{R}\right) \quad (8)$$

式(8)包含着本地市场效应:若国家 i 的市场规模(s_E^i)大于平均规模(即 $s_E^i > 1/R$),则 $s_n^i > s_E^i$,国家 i 是资本净输入国(即工业品市场份额增加),国家 $j(j \neq i)$ 是资本净输出国(即工业品市场份额减少)。另外,式(8)也包含着本地市场放大效应:当国家间的贸易自由度增加时,资本向国家 i 流动的集聚效应将显著增强。因此,经济自由化提高了大国的工业份额,降低了小国的工业份额。上述结论揭示了多国自由资本模型具有聚集力的一般含义,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区使得贸易集团内部成员获益,这就是所谓的“投资区位效应”。^①

(三)非对称情况下多国自由资本模型的矩阵形式

由于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各国的经济规模、对外贸易成本和要素禀赋并不相同,因此需要构建非对称情况下多国自由贸易区模型。将上述多国自由资本模型写成矩阵形式,即 R 个地区的工业品价格指数 P_M 、工业品生产企业个数 N 、工业品生产企业占企业总数的份额 λ 以及资本报酬率 Π 均为 R 维向量,那么有:

$$P_M = \begin{bmatrix} P_{M1} \\ P_{M2} \\ \vdots \\ P_{MR} \end{bmatrix}, N = \begin{bmatrix} n_1 \\ n_2 \\ \vdots \\ n_R \end{bmatrix}, \lambda = \begin{bmatrix} \lambda_1 \\ \lambda_2 \\ \vdots \\ \lambda_R \end{bmatrix}, \Pi = \begin{bmatrix} \pi_1 \\ \pi_2 \\ \vdots \\ \pi_R \end{bmatrix} \quad (9)$$

令 Φ 为一个 $R \times R$ 阶方阵,表示 R 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可得:

$$\Phi = \begin{bmatrix} 1 & \phi_{12} & \cdots & \phi_{1,R-1} & \phi_{1R} \\ \phi_{21} & 1 & \cdots & \phi_{2,R-1} & \phi_{2R}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vdots \\ \phi_{R-1,1} & \phi_{R-1,2} & \cdots & 1 & \phi_{R-1,R} \\ \phi_{R1} & \phi_{R2} & \cdots & \phi_{R,R-1} & 1 \end{bmatrix} \quad (10)$$

定义 E 和 Θ 为一个 $R \times R$ 阶对角矩阵,对角线上的元素分别表示 R 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和生产要素的分布情况,可得:

$$E = \begin{bmatrix} E_1 & 0 & \cdots & 0 \\ 0 & E_2 & \cdots & 0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0 & 0 & \cdots & E_R \end{bmatrix}, \Theta = \begin{bmatrix} s_E^1 & 0 & \cdots & 0 \\ 0 & s_E^2 & \cdots & 0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0 & 0 & \cdots & s_E^R \end{bmatrix} \quad (11)$$

因此有: $\Theta = \frac{E}{TE} = \frac{E}{E_1 + E_2 + \cdots + E_R}$ 。

根据上述定义,工业品的价格指数矩阵 P_M 可以表示为:

$$P_M = (\Phi N)^{\frac{1}{1-\sigma}} p \quad (12)$$

此时资本市场出清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N = \lambda K \quad (13)$$

其中, K 为 R 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在 $D-S$ 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利润为零。因此有:

^①在自由贸易区(FTA)的情况下,导致产业由 FTA 之外向 FTA 内部转移,从而导致资本由 FTA 之外的国家流向 FTA 内部的国家。生产转移也意味着“投资的转移”,即“投资区位效应”。

$$\Pi = \mu(p - a_M)(\Phi E)(\Phi N)^{-1} \quad (14)$$

将式(13)代入式(14)可得:

$$\Pi = [\mu(p - a_M)/K](\Phi E)(\Phi \lambda)^{-1} \quad (15)$$

由于 $\mu(p - a_M)/K$ 是一个常数, R 个国家的总收入不变, 即 TE 亦为一个常数。再次对式(15)进行整理, 可得:

$$\Pi' = (\Phi \Theta)(\Phi \lambda)^{-1} \quad (16)$$

在均衡条件下, 每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相同, 因此 Π' 是一个所有元素都等于 π 的向量。由于 R 个国家的资本存量满足下式:

$$\lambda_1 + \lambda_2 + \dots + \lambda_R = 1 \quad (17)$$

式(16)和式(17)是非对称情况下多国自由资本模型的均衡条件。据此, 可以得出在不同的贸易自由度下, 不同国家工业品的市场份额 λ_i 。

三、TPP 的投资区位效应及其应对策略模拟

(一) 实证研究设计

上述新经济地理学的多国自由资本模型显示, 企业投资区位选择发生改变主要归因于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等非均衡力及其作用形成的循环累计因果关系, 区域市场规模以及区内区外贸易自由度的大小是影响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TPP 可以看作是一个自由贸易区, 成员国间贸易自由度的增强以及区内市场规模的扩大, 势必引发双层本地市场效应(即双重投资区位效应), 对非 TPP 的亚太国家的直接投资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本文尝试运用上述多国自由资本模型, 从国际直接投资的角度, 以工业品市场份额的变化来反映相关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变化, 以此阐释 TPP 对亚太地区各国经济福利的影响。

首先依据亚太各国的地理区位和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对国家进行分类, 确定 R ; 其次通过式(10)确定非对称情况下各类国家的贸易自由度 ϕ_{ij} , 通过式(11)确定各类国家的经济规模 s_E^i ; 最后利用非对称情况下多国自由资本模型的均衡条件, 分别研究 TPP、RCEP、TPP 和 RCEP 共存三种情况下不同类型国家工业品市场份额 λ_i 的变化, 以 λ_i 的动态变化反映发生在 TPP/RCEP 内部及 TPP/RCEP 之间的各类国家的投资区位效应。考虑到高次的代数方程没有一般的代数解法, 为此, 我们借助 1stOpt 软件, 利用数值模拟的方式来获得均衡结果。

1. 国家的分类。到目前为止, TPP 的成员国共有 12 个, 即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智利、秘鲁、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文莱、越南、马来西亚和日本。前 5 个为美洲国家, 其余 7 国为 RCEP 涉及的部分国家。TPP 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 它将改变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 对亚太各国造成影响。因此, 除 TPP 谈判涉及的 12 国以外, 本文还选择 RCEP 谈判涉及的 9 个未参加 TPP 谈判的国家(即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泰国、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进行研究。考虑到相对于美国和中国, 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较小, 为方便对 TPP 和 RCEP 形成后的投资区位效应进行模拟, 将这 21 个国家分成四类: 美洲国家(类型一)、TPP 7 国(类型二)、中国(类型三)、RCEP 8 国(类型四)。^①

2. 经济规模 s_E^i 的设定。在新经济地理学中, 各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品支出份额的确定

^① 美洲国家, 指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 TPP 7 国包括日本、文莱、新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 RCEP 8 国指未参加 TPP 谈判的除中国以外的 8 个 RCEP 国家。

至关重要,它关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及与此相关的报酬递增和工业品价格指数等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以 GDP 代表资本和劳动资源的规模,并以此确定各国份额。由于在模拟分析时将涉及的所有国家或地区视为一个经济整体,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借鉴 Christiansen(2010)的数据处理方法,依据 IMF 的数据,初始状态(2013 年)下,美洲国家、TPP7 国、中国和 RCEP8 国的资本和劳动占资源总量的初始比重分别为: $s_E^1=0.4$ 、 $s_E^2=0.2$ 、 $s_E^3=0.2$ 和 $s_E^4=0.2$ 。

3. 贸易自由度 ϕ_{ij} 的设定。本文涉及各个国家的贸易自由度以美国传统基金(Heritage Foundation)公布的 2013 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衡量。对各国的贸易自由度得分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出四类国家的相对贸易自由度依次为: $\varphi_1=0.28$ 、 $\varphi_2=0.26$ 、 $\varphi_3=0.24$ 和 $\varphi_4=0.22$ 。^①

(二) TPP 的投资区位效应分析

TPP 包含的内容和条款具有高标准和更全面的自由贸易特征,不仅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还囊括了原产地规则、关税手续、技术性贸易壁垒、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电子商务交易、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在原产地规则上,对产品是否符合原产地标准的要求很高。比如,对于纺织品,美国要求所谓的“纺纱前沿规则”(yarn forward rule),即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服装等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到加工为成衣的全过程都必须在 TPP 成员国内完成。这样,如果 TPP 国家从中国进口纺纱等原材料将无法适用 TPP 的关税优惠和配额等。该措施增强了 TPP 内部的本地市场效应,必然改变原有的亚太地区的投资生产布局。另外,在投资自由化问题上,TPP 将建立全面且高标准的投资协定,如在外资市场准入方面要求采取“否定列表”方式,并主张在设立外资企业后享受国民待遇。这无疑会提高 TPP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度,进而吸引更多的区外企业投资于 TPP 内部,再次放大 TPP 的本地市场效应。为验证上述分析结果,下文采用多国自由资本模型进行数值模拟。

现实中,美国高调宣布加入并极力推崇 TPP,其要旨在于非传统经济收益的获得,即实现其“回归亚太”的目的,在经济安全层面开创并主导 21 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新标准等。TPP 其他成员国(日本除外)则主要寄希望于从 TPP 中获得经济收益。比如,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东盟国家主动参与 TPP,不但希望获得美国市场的准入,减轻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还希望通过 TPP 获得信号效应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沈铭辉,2012)。故在美国的主导和推动下,TPP 相关国家极有可能最终达成协议。在模拟过程中,假设当前阻碍 TPP 达成的各种困难在各成员国间均已得到让步和解决;并且,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亚太地区并未形成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如 RCEP 或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即类型一和类型二国家形成 FTA 即 TPP,而类型三和类型四国家尚未采取任何行动。此时,类型一和类型二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相同,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却不同,也即 $\varphi_{12}=\varphi_{21}=\varphi$ 、 $\varphi_{13}=\varphi_{14}=\varphi_1=0.28$ 、 $\varphi_{23}=\varphi_{24}=\varphi_2=0.26$ 、 $\varphi_{31}=\varphi_{32}=\varphi_{34}=\varphi_3=0.24$ 、 $\varphi_{41}=\varphi_{42}=\varphi_{43}=0.22$ 。考虑到不同类型国家的贸易自由度均已大于 0.2,而且即使自由贸易区内部完全达成自由贸易,但贸易成本(如运输成本等)仍然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将贸易自由度的区间设定在 0.2 与 0.55 之间(以下相同)。模拟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a 显示,如果粗略地将国家分为 TPP 成员国和非 TPP 亚太国家两类,随着 TPP 成员国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外资市场准入方面“否定列表”方式的实施以及设立外资企业后享受

^①计算公式: $\phi_i = \text{第 } i \text{ 类国家贸易自由度得分的平均值} / \sum_{i=1}^4 \text{第 } i \text{ 类国家贸易自由度得分的平均值}$, $i=1,2,3,4$ 。例如,若类型一国家并未与其他三类国家达成 TPP 或者 RCEP,则 $\phi_1=0.28(=\phi_{12}=\phi_{13}=\phi_{14})$ 表示类型一国家对其他三类国家的贸易自由度均为 0.28。另外,考虑到文莱的贸易自由度数据缺失,因此在计算不同类型国家的贸易自由度时将其剔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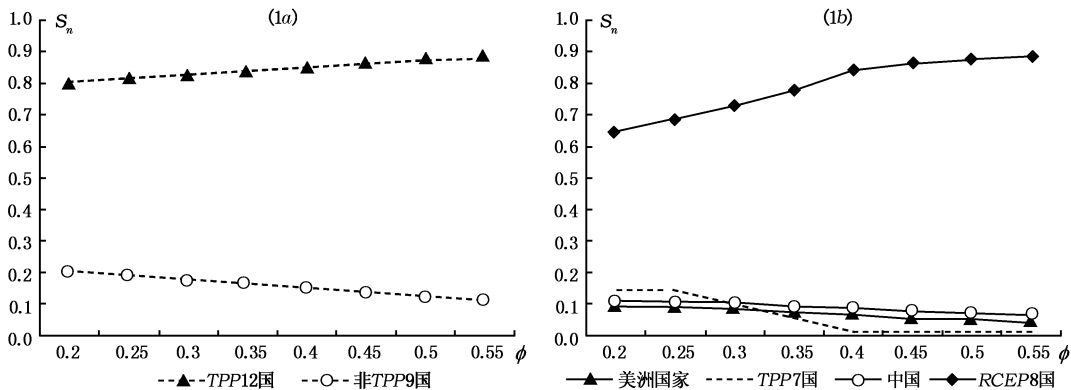


图 1 TPP 下亚太地区生产活动的区位分布

国民待遇等增加成员国之间贸易自由度措施的实施(沈铭辉,2012),*TPP* 外部国家的一些企业会选择到 *TPP* 成员国投资,*TPP*12 国(即美洲国家和 *TPP*7 国)工业品的市场份额将逐渐增加,而非 *TPP*9 国(即中国和 *RCEP*8 国)由于未采取任何措施,其市场份额将逐步下降。进一步将国家类型细分为四类进行模拟,各类国家的市场份额变化见图 1b。此时,中国和 *RCEP*8 国由于在 *TPP* 形成期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其国内的市场份额持续下降,但下降速度较为缓慢。^① 在 *TPP*12 国内部,*TPP* 达成初期 *TPP*7 国的市场份额略有上升,这可能是由于 *TPP*7 国增加了新的市场准入,促使 *TPP* 中的美洲国家和非 *TPP* 国家为绕开原产地规则等非关税壁垒而增加了对其投资,但由于 *TPP*7 国经济规模较小,故其市场份额增长空间十分有限,长期中也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相反,对于 *TPP* 中的美洲国家来说,其经济规模远大于 *TPP*7 国,故其得益于 *TPP* 内部的本地市场效应,使得市场份额逐渐增多,最终成为核心国,并主导亚太一体化。这些结果符合新经济地理学多国自由资本模型中本地市场的双重投资区位效应,即经济自由化有利于大国而不利于小国。在多边自由化过程中,最小的国家首先失去其工业份额,随着自由化的推进,其他国家依据市场规模小于平均市场规模的程度,依次变成“边缘”国家;当贸易完全自由化时,所有工业都将集中于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

(三)中国及其他亚太国家应对 *TPP* 的策略模拟

上述模拟证实,*TPP* 会改变亚太地区的投资格局。在长期,中国及其他非 *TPP* 亚太国家以及 *TPP* 中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多数属于东亚国家)亦有被边缘化的可能。那么中国及其他亚太国家应该如何应对? 寻求能否有效应对 *TPP* 的负面冲击? 若 *TPP* 和 *RCEP* 双轨并行,哪些国家最有利? 下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着重分析。

对于不同国家(地区)而言,最佳区域合作安排存在差异,因此根据各国(地区)发展水平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径才是上策。前文已提及,美国将 *TPP* 视为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一条通道,但由于其天生的高标准,很多东亚国家对是否加入 *TPP* 存在矛盾和复杂的心态。而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10+6”)共同参加的 *RCEP* 成为实现 *FTAAP* 的另一可行路径。与 *TPP* 相比,*RCEP* 追求一体化的程度远不如前者,还只是部分领域超越 *WTO* 的协议,它侧重货物贸易、部分服务贸易和投资措施,故 *RCEP* 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更强。尽管很多学者已经将 *TPP*

^① 由于中国和 *RCEP*8 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天然的贸易成本(如运输成本等),图 1b 并未出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所预示的零市场份额的极端情况,但是这些国家仍然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

视为未来 FTAAP 的基础,但其谈判仍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在关税减让方面,能否打破农产品高关税壁垒成为成员国之间(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农产品市场准入)以及成员国国内(日本国内利益集团反对农产品开放)的主要障碍。此外,TPP 还面临“国内规则一致”等横向议题的执行程度问题。因此,短期内 TPP 达成的难度也不小。

基于以上事实,本文假定中国及其他亚太国家寻求 RCEP 合作并取得成功,然后区分两种情况探讨其效果。

情况一:TPP 尚未实现,而 RCEP(主要指类型二、类型三和类型四国家)顺利达成。RCEP 是东盟基于中日提案提出的一个亚太合作的新框架,由亚洲 14 个发展中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与 TPP 相比,其地缘凝聚力更强,一体化标准更低(如较少涉及敏感行业部门、对降低贸易壁垒的要求更低等),更为重要的是 RCEP 包含了目前全球最具活力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全新的倡议,RCEP 谈判可能遇到阻碍,也很难实现各成员方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但其作为东亚合作平台却已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即使美国也不会不顾东盟的利益而横加反对。因此,RCEP 以较低程度的合作首先达成,而把一些矛盾和分歧较大的问题留待后续推动也未尝不可。

具体来说,该情形下四类国家的贸易自由度参数为: $\phi_{12}=\phi_{13}=\phi_{14}=\phi_1=0.28, \phi_{21}=\phi_2=0.26, \phi_{23}=\phi_{24}=\phi_{32}=\phi_{34}=\phi_{42}=\phi_{43}=\phi, \phi_{31}=\phi_3=0.24, \phi_{41}=\phi_4=0.22$ 。^①数值模拟 RCEP 下亚太地区生产活动的区位分布情况,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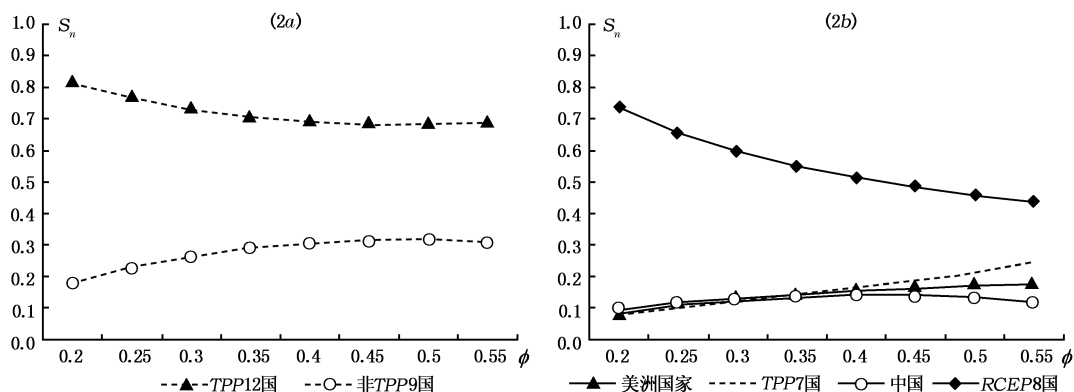


图 2 RCEP 下亚太地区生产活动的区位分布

图 2a 显示,不仅非 TPP9 国扭转了被边缘化的命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东亚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区域内的投资份额由原来的 20% 上升到 30% 左右)。图 2b 中,国家同样被分为四类,其中 TPP7 国(类型二国家)的市场份额稳中有升,这不仅得益于加入 RCEP 带来的广大市场,而且 TPP7 国中多数国家都与美国签订双边协定,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等,故美国等美洲国家对 TPP7 国的贸易自由度要高于其他 RCEP 国家;中国 and RCEP8 国的市场份额也有缓慢的上升,其工业品市场份额明显高于不作为的情况(图 1b)。由此可见,在 TPP 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加快团结有共同利益的亚太国家,共同寻求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的 RCEP 合作,或许是不错的现实选择。

情况二:TPP 和 RCEP 同时达成。美国希望通过 TPP 来激活亚太区域合作,为其倡

^① TPP 尚未实现,类型一国家与类型二、类型三、类型四国家彼此之间的贸易自由度不同,也即: $\phi_{12}=\phi_{13}=\phi_{14}=\phi_1=0.28, \phi_{21}=\phi_2=0.26, \phi_{31}=\phi_3=0.24, \phi_{41}=\phi_4=0.22$; RCEP 顺利达成,类型二、类型三、类型四国家彼此之间的贸易自由度相同, $\phi_{23}=\phi_{24}=\phi_{32}=\phi_{34}=\phi_{42}=\phi_{43}=\phi$ 。

导的亚太合作制定游戏规则,实现“亚太再平衡”目标,而东盟国家则竭力维持原有的东亚区域合作框架以维护其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亚太/东亚合作确实进入了多重博弈及框架重构阶段。但乐观的看法认为,RCEP 与 TPP 是互相补充、互相推进的两个进程,反映了处于不同阶段的经济体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不同诉求,完全可以平行推进,并根据形势变化展开良性互动;因此,双轨运行模式可以形成,但或许是不对称的形式(王玉主和富景筠,2013)。美国贸易代表 Ron Kirk 也曾强调,亚太地区有足够空间让 TPP 和 RCEP 这两个协议并存。2014 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亚洲博鳌论坛时也曾表示,RCEP 和 TPP 应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补充,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和相互促进。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对 TPP 和 RCEP 同时达成的情况进行数值模拟,各类国家间贸易自由度参数^①如下: $\varphi_{12}=\varphi_{21}=\varphi_{23}=\varphi_{24}=\varphi_{32}=\varphi_{34}=\varphi_{42}=\varphi_{43}=\varphi$, $\varphi_{13}=\varphi_{14}=\varphi_1=0.28$, $\varphi_{31}=\varphi_3=0.24$, $\varphi_{41}=\varphi_4=0.22$,模拟结果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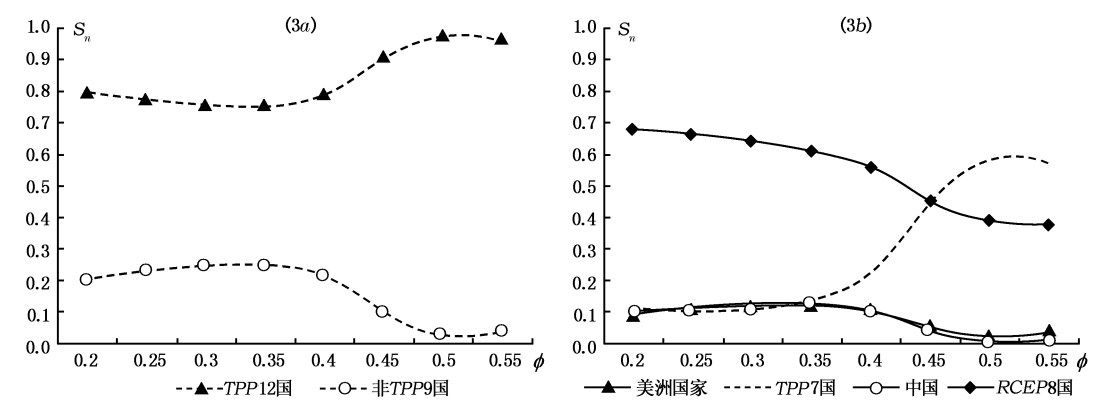


图 3 TPP 和 RCEP 共存下亚太地区生产活动的区位分布

图 3a 显示,TPP 和 RCEP 双轨运行情况下,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 RCEP 8 国)通过 RCEP 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 TPP 的“零关税、无例外”等高标准贸易规则的冲击,使其国内的市场份额有所上升,同时亚太地区两大贸易协定势均力敌的局面也将维持一段时间,TPP 12 国的市场份额会略有下降;这主要归因于 TPP 12 国中有具有双重身份的 TPP 7 国,其在直接投资过程中首先会选择成本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因此会相对增加非 TPP 9 国的市场份额;而在长期,则会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和贸易成本来选择,故在长期 TPP 12 的市场份额有逐渐回升的趋势,而非 TPP 9 国的市场份额则趋于减少。图 3b 显示了细分的四类国家市场份额变化情况。显然,具有双重身份的国家优势非常显著,这可能得益于其面对 TPP 和 RCEP 两大市场,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而中国及其他 RCEP 8 国,尽管 RCEP 和 TPP 同时达成也没有使其摆脱市场份额下降的结果,但相对于不作为的情况(图 1b),在贸易自由度不高时其工业品份额有所提高,即寻求 RCEP 合作为其国内做好应对 TPP 的冲击赢得了时间。因此,可以推定,涵盖整个亚太地区的 FTAAP 才是亚太合作的最优选择。

^①若 TPP 和 RCEP 同时达成,内部的开放度或者等同变化,或者不是。本文只考虑了相对简单的情况,即 TPP 和 RCEP 内部开放程度等同变化;故 $\phi_{12}=\phi_{21}, \phi_{12}=\phi_{21}=\phi_{23}=\phi_{24}=\phi_{32}=\phi_{34}=\phi_{42}=\phi_{43}$,且都等于 ϕ 。而类型一国家与类型三和类型四国家分属 TPP 和 RCEP,彼此之间贸易自由度不同,即 $\phi_{13}=\phi_{14}=\phi_1=0.28, \phi_{31}=\phi_3=0.24, \phi_{41}=\phi_4=0.22$ 。

四、结论与研究不足

运用多国自由资本模型从内生角度解释自由贸易区下投资区位转移的研究已成为一种趋势,反映了新经济地理理论应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对 TPP 的投资区位效应及其应对策略模拟分析表明,美国主导的 TPP 会改变亚太地区的投资生产布局,不仅将降低以中国为代表的非 TPP 亚太国家的工业品市场份额,而且在 TPP 内部也将出现了核心—边缘结构。为扭转非 TPP 亚太国家日渐被边缘化的颓势,通过寻求 RCEP 合作,其市场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改观,而具有 TPP 和 RCEP 双重身份的国家受益最大。然而,TPP 是美国为取得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应对东亚合作进程,特别是应对中国崛起而做出的战略部署,其高标准(如知识产权、特殊行业的自由化、环境以及劳工标准等方面)对中国而言过于苛刻,短期内中国加入 TPP 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应对:

第一,在区域合作层面,应继续强化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一方面,积极同 TPP 成员国签订双边或多边 FTA,避免长期被孤立于国际主流经贸规则之外。考虑到 TPP 内部规模较小的成员国亦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同 TPP 成员国签订双边或多边 FTA 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应积极主动参与东盟主导的 RCEP 谈判,延长被 TPP 边缘化的时间,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 TPP 所造成的投资和贸易转移等不利冲击。以务实的行动积极推进双边或多边 FTA,不仅可以掌握发达经济体的区域合作动态,而且也有助于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赢得主动权。

第二,在国内经济层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内需是有效应对 TPP 负面影响的根本;中国对 TPP 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因此,一方面,通过构建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一方面,主动以开放倒逼国内深化改革,尽快完善国内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制度与环境;另一方面,以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建立为契机,积极在国内推进单边的市场开放政策,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大力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吸引高技术密集型的直接投资,进一步扩大本地市场效应,从而通过内外呼应来缓解 TPP 的负面冲击。

本文应用多国自由资本模型分析了 TPP、RCEP 以及 TPP 与 RCEP 共存三种情况下亚太地区投资区位的变化,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在实证研究设计中,主要遵从多国自由资本模型的内在机理进行模拟分析,即贸易自由度变化引起工业品市场规模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生产和投资分布发生变化。然而,在理论模型构建和分析中却未能充分融入 TPP 因素,这也是亟待改进的方向。(2)对于一些政治因素,如政治制度和外交策略等并未在模型中量化,部分国家追求非传统收益的经济一体化动机没有在模型中得到反映。(3)仅将亚太国家分为四类加以考察,没有对文中涉及的 21 个国家各自的投资区位变化作详细讨论,在应对措施上,也未考虑除 RCEP 合作以外的其他措施。这些不足均需在后续研究中加以完善。

* 本文受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基金重点项目(HSZD2014-03)资助。

参考文献:

- [1]安虎森. 新经济地理学原理[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 [2]李向阳.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J]. 国际经济评论, 2012, (2): 17—27.
- [3]刘昌黎.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发展与困境[J]. 国际贸易, 2011, (1): 38—43.
- [4]鲁晓东, 李荣林. 区域经济一体化、FDI 与国际生产转移: 一个自由资本模型[J]. 经济学(季刊), 2009, (4): 1475—1496.
- [5]沈铭辉.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 中国的视角[J]. 当代亚太, 2012, (1): 5—34.

- [6]万璐. 美国 TPP 战略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 GTAP 模拟的分析[J]. 当代亚太, 2011, (4): 60—73.
- [7]王玉主, 富景筠. 当前亚太区域合作形势分析[J]. 亚太经济, 2013, (4): 3—7.
- [8]Baldwin R E, Venables A J.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M].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95.
- [9]Baldwin R E, Forslid R, Haaland J I. Investment creation and diversion in Europe[J]. The World Economy, 1996, 19(6): 635—659.
- [10]Christiansen O. Industry relocation, linkages and spillovers across the Baltic Sea: Extending the footloose capital model[J]. Baltic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1): 61—78.
- [11]Lewis M K.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w paradigm or wolf in sheep's clothing? [J].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2011, 34(1): 27—52.
- [12]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483—499.
- [13]Martin P, Ottaviano G. The geography of multi-speed europe[R]. CEPII Research Center Working Papers No.1995-10. 1995.
- [14]Puga D, Venables A J.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and industrial loc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43(3): 347—368.
- [15]Seshadri V S.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R]. RIS Discussion Papers No.182. 2013.
- [16]Williams B 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countries: comparative trade and economic analysis[R].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13.

TPP's Investment Location Domino Effect and Non-TPP Asia-Pacific Countries' Countermeasures: Analysis Based on R-FC Model

Xu Peiyuan, Wei D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and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this paper numerically simulates TPP's investment location domino effect and non-TPP Asia-Pacific countries' countermeasures by the introduction of R-FC model. It reach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the formation of TPP leads to dual investment location domino effect, namely in internal TPP, large countries possess greater industrial product market share, thereby becoming the core countries, and outside the TPP, the investment of non-TPP countries flows into to the members of TPP with the rise in trade freedom inside the TPP, further amplifying the investment location domino effect; the dual investment location domino effect determines the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llo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ondly, as the countermeasure, the accomplishment of RCEP in advance will be a good real choice; if RCEP and TPP are reached simultaneously, the countries as TPP and RCEP members will benefit most. Therefore,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f the TPP, China should actively sign a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FTA with TPP members and initiatively participate in RCEP led by ASEAN.

Key words: TPP; investment location domino effect; R-FC model; RCEP

(责任编辑 周一叶)